

■ 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

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外交中的文化因素

刘 再 起

(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刘再起(1967-)男, 湖南衡阳人,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俄文系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与俄罗斯对外政策研究。

[摘 要] 20 世纪末苏联意识形态文化的认同面临严重危机, 随之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文化因素对俄罗斯人对现代社会和政治的认同及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及其相应机制的建立已经产生, 而且仍将产生重要作用, 要观察和研究今天俄罗斯社会的种种现象及其内外政策, 必须考虑其特有的历史、传统、宗教和民众心理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 俄罗斯; 政治外交; 文化因素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5)03-0357-05

20 世纪最后 10 年, 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在不到 15 年的时间里, 俄罗斯人民经历了社会制度的剧变、叶利钦时代的混乱和“民主”, 到普京总统的“可控制”民主, 俄罗斯社会又一次面临“传统”、“西方化”和现代“全球化”的撞击。其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则忽“西”忽“东”, 甚至“不西不东”。转型时期俄罗斯的内外政策给人一种摇摆不定和难以把握、难以预测的感觉。

要研究现实中的俄罗斯, 必然要触及一个历史的、文化的、包括宗教的俄罗斯。可以说, 文化因素(包括历史、传统、宗教、心理等)对转型时期俄罗斯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的认同以及对俄罗斯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均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是对当代俄罗斯人对现代社会和政治的认同及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及其相应机制的建立产生了、而且仍将产生重要影响。

一

20 世纪最后 10 年间, 俄罗斯进入急剧变化的时期, 随之而来的是深刻的文明危机。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化机制也在废除先前的、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制度的过程中消失。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路线变了, 生活的前景已不再像往日那样明确。就连把自己同固定的价值和观念体系加以对比的可能性也不复存在, 对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神话的质疑和对苏联意识形态认同的否定是俄罗斯人民对国家和政权产生动摇的重要原因。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和“公开性”, 这种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背道而驰的改革注定要失败。

在俄罗斯传统上, 对比价值观、行为的目的意义和模式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国家的文化政策。直至 19 世纪末期, 俄罗斯的这种政策与其说是“服务”于民族社会文化空间的一体化, 不如说是“服务”于加深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之间——“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之间的分裂。就在颇有一部分精英作出推崇西方文明的选择的同时, 在大众阶层中占绝对优势的仍然是崇尚传统的心态。国家对“民众”的文化政策, 是建立在家长式的监护以及对新的文化的形成加以隔离的原则上。

在苏维埃制度最后几十年间,与其内外政策相一致的文化政策也丧失了凝聚民众认同的作用。不仅如此,国家本身也开始解体。屈指可数的几年、甚至几个月里,国家的地位改变了:边界重新划定,主权则要得到确认。“大国”地位的丧失使俄罗斯民众的意识遭到惨痛的打击,意识里开始形成独特的“缺陷情绪”。在社会动荡不安、政策变化无常的生存环境里,人们被迫选择生存下来的方针、国家的深刻危机和经济衰退促使俄罗斯社会群体形成“否定的认同性”,它的基础是对任何已知经验、包括自己亲身的经验作出否定的定位。民众意识中的这类过程是对危机局势的一种心理反应,可以看做是适应现代化困难和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人们对“自由”和“民主”的极度失望,对当政者及其内外政策冷嘲热讽,导致当政者以不断变换“总理”来应付。

今天,关于俄罗斯现代化模式讨论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所谓“特殊途径”的问题。“特殊途径”的理念在俄罗斯民众意识中早已根深蒂固。对这一理念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群体和个人层面对生活战略的选择。这种理念一再出现在“西方派”和“乡土派”、“欧洲派”和“欧亚派”、“现代派”和“传统派”的思想政治分野之中。同“特殊途径”联系在一起的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具有条分缕析的利益体系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所取得的成就的观念。在转折时期,当国家面临选择本民族现代化模式时,俄罗斯精英群体往往积极“抛出”这类问题进行政策辩论。

“特殊途径”是用来解释为了个人利益而背离有理有据的发展道路的一种十分方便的理论。这种个人利益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期显露得格外清楚。不过,在俄罗斯历史上个人利益在公众的关注中总是处于从属地位。具有独特意义的认同因素是集体因素而非个人因素。集体因素的最高体现则是国家。

加强国家观念、巩固国家机构向来被民众意识视为克服危机和解决矛盾的主要手段,俄罗斯历史上所有转折阶段的情况都是如此,不论是异教危机和接受基督教、抗击蒙古和鞑靼人入侵、伊凡雷帝的改革、“混乱时代”、教会分裂和彼得大帝改革、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国家制度的现代化,还是苏联时期实行动员式的发展模式。国家总是执行“征地”(扩张)的任务,而政权制度则是帝国的基础。这种制度目的明确,为巩固“强国”的理念服务,制度本身则是强国的具体体现。强国观念是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它在俄罗斯的国家体制建设中起过使文化得以形成的作用。

在当前这一代俄罗斯人自我认同的体系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这种功能。对国家的期望值依旧很高,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些期望无法实现,才导致人们对当权者的深刻不信任。尽管今天在俄罗斯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关系的“非国有化”,但家长式统治的情结并未失去意义——大多数俄罗斯人仍希望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的“义务范围”。在笔者看来,这也许是国家衰弱时期叶利钦政府大力推行“民主”和“个人自由”的政策不受欢迎的原因。

俄罗斯向来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它的文化从来都既不是单一民族的,也不是按民族定位的。俄罗斯历史各个阶段的一体化因素乃是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动力。今天,保持民族文明和社会政治统一的强烈愿望以讨论“民族观念”和“民族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了探寻这种认同性的民众基础,维护传统的一些小的群体仰赖以往俄罗斯帝国时期的经验。而“伟大的人民”和“伟大的文化”的神话成分则相应地有了现实意义,它赞同这样一种期望,即俄罗斯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一种宗教似的、喜欢强加于人的信念)。对一些持有恢复传统心态、并未结成一体的群体(例如老一辈俄罗斯人)而言,占主导地位的认同因素仍然是“超级大国”和“公正的苏维埃制度”的观念,其集体立场则体现在其政治偏向中,包括在选举中支持那些希望继承苏联政治遗传的政党。

俄罗斯学者 И. Г. 雅科文科正确地指出:“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类型决定了社会的各种形式。”^[1](P 49)俄罗斯思维方式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变成对最高权力的神圣化,同时在民众意识中,领袖形象一成不变的本质属性,不是协调各方立场并达成妥协的能力,而是善于强加自己的意志、采取行动和排列权力关系中的职位等级的本领。对领袖地位本质的这种理解,对政权机关和新经济的主体而言都是很典型的。善于支配别人而不情愿以理服人,这样一种生硬的领导作风,就是俄罗斯社会群体各个层

面确立领袖地位制度的关键意识和机制。

按照俄罗斯民众的理解,领袖依旧作为家长式统治期待的主要对象而出现,况且在国家体制失效、社会运转失序的地方,领袖有时不得不代替政权机关担负起国家的功能。一句话,俄罗斯是个极其崇尚权威的民族,普京总统的强硬形象甚至可能逐步滑向专制的执政作风,在俄罗斯不仅没有受到抵制,反而受到欢迎,这或许是俄罗斯人深沉的历史民族文化情结使然。

二

在形成俄罗斯社会政治认同的各种文化因素中,神话占有特殊地位。

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慰藉形式,神话在苏联时期通过动员求发展的条件下曾得到积极利用,起过构建对苏联体制的认同的基本手段之一的作用。神话化的往昔的幻影充当了把民族成分和文明成分联系在一起的中间环节,保证了这些成分的影子能投射到未来的空想社会中去。关于“最公正的制度”的神话构筑在自古以来对理想苦苦企盼的基础上,并表现为通俗易懂和引人入胜的生动形式。它形成了“历史乐观主义哲学”。笔者认为,这正是当时的俄罗斯社会对苏联意识形态和政治外交制度能得到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文明危机的条件下这类理念便失去了往昔的力量。在转折时期的俄罗斯,实用现实主义迅速在新经济主体的领域占领阵地,这些主体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行为模式的拥护者。然而,实用主义的取向目前在民众各阶层尚未占主导地位。2003年的俄罗斯议会和2004年的总统选举结果表明,神话化的观念(例如认为领袖是稳定的主要保障)依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俄罗斯人的政治偏向。

西方或西方化向来是确定俄罗斯发展目标和任务的独特的坐标体系。在俄罗斯精英群体中,西方的经验和成就有可能作为敌对的文明成分而遭到摒弃(20世纪30—50年代),但也有可能被看成是需要采用的标准(这种态度在1961年通过的苏共纲领中得到了反映),甚至有可能被当做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和模仿的范例(叶利钦时代自由主义改革派的规划方案)。同样在民众阶层中,尤其是在商品匮乏的条件下,西方的经验成了一切优秀和先进事物的象征。

今天在政治实践、法人团体管理或消费领域,完全重复西方模式的方针会冲掉俄罗斯的民族成分,但向外借用作为文明现代化的一个因素的问题也有其另一面。这种借用能促使人们清除与西方对立的观点,促使文明与西方接近。这里首先是指历史上跟俄罗斯关系接近的欧洲。如果说美国(尤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今天多半会引起俄罗斯人否定的反应,那么欧洲在今天的俄罗斯社会会得到坚决肯定的接受。

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整个欧洲地域的边界及俄罗斯在其中的地位成了热烈的政治争论的话题。由于欧盟的扩大,美国居于领袖地位并用强制手段推行政策,致使美欧分歧加剧,导致“老”欧洲公开疏远美国咄咄逼人的文化扩张政策。在这样的条件下,俄罗斯在美欧关系体系中的定位不仅是它的对外政策方针、而且也是就发展这种或那种模式的文明作出选择的重要因素。

作为一种理想典型结构,欧洲文明的认同感建立在忠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及公民忠于国家的基础之上。欧洲发展模式中含有一定的扶危济困的成分和对社会调节的一体化机制的肯定。不久以前这一体系中还列入了培养行为的社会规范和模式的文化制度。今天的欧洲正在积极审订各种文化制度。在笔者看来,归入目前优先考虑范围的,与其说是培养思想政治倾向及相应的政治行为模式,不如说是推进社会的积极因素和宽容与社会和谐的价值观,丰富社会生活,培养公民自豪感及发展个性。在俄罗斯的历史上,精英阶层对欧洲文明向来推崇备至,但要彻底地西方化,在俄罗斯又缺乏广泛的民众文化基础。这也可以用来理解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忽“西”忽“东”,而给人之感觉又不“东”不“西”的原因。

三

文化边缘状态在俄罗斯也有其社会根源。这种状态的基础是划分现代化过程中“包括在内者”和“排除在外者”之间的界限。社会分化现象急剧增长,居民收入水平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2003年秋属于“贫困”(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标准)之列的俄罗斯人占23%,而据俄罗斯联邦社会舆论基金会的专家评估,这个比例约占全国居民的2/3^[2](P1)。社会规范失调的不可避免的加剧,是当代俄罗斯社会政治制度的全民族认同感形成的严重障碍。

社会阶层的分化最为明显地具体体现在消费模式上,这种模式不仅日益体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体现了文化选择。对不同的休闲和消费形式的选择使收入水平分处两极的群体的人们“分道扬镳”。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俄罗斯社会的分裂,因为“由于没有明确表现出来的社会结构,公民很难通过大的社会群体得到肯定的认同”。与此同时,民族文化复兴的后果之一是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的增长。今天俄罗斯大多数居民对移民和外来文化影响持极端否定的态度。比如,在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2003年9月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半数以上的答卷人同意这种观点,即居住在俄罗斯的非俄罗斯族人对它的安全带来威胁,而且年青人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占58.7%^[3](P6)。

“大”族群和“小”族群人们之间的文化距离和差异在外来移民密集居住的地区特别明显。在这一方面十分典型的是俄罗斯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那里最近15年来,亚美尼亚人移民社群有了很大增长,还有数万土耳其——梅斯赫特人在那里安家落户。另一个异族恐惧症的发源地是远东(“中国威胁论”),这种恐惧意识在今天俄罗斯的对华政策中也隐约可见:对中国既合作又防范。

传统上人们对全俄罗斯文化空间的综合评语是“宗教信仰文化”。宗教对大千世界的理解确立了对民族文明认同的基础,也确立了这种文明认同的民族内容。创造力被注入宗教内容的艺术之中,而民众意识则把自己和这种艺术加以对比,认为它是民族精神风貌的体现。

在现代俄罗斯,宗教因素对俄罗斯内外政策的形成起着显著作用。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宗教是生活中“重要的”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4](P10)。比如在2003年,宣称自己属于某一教派的俄罗斯人占60.5%。他们把宗教自我认同看成是文化、民族和文明自我定位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论参与教会活动的程度如何,55%的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是东正教徒,大部分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认为自己是穆斯林,大部分卡尔梅克人则认为自己自己是佛教徒^[5](P10)。

在大的族群聚居的地方,宗教认同在个人定位体系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反对族际通婚的人数比例在增大,这无疑是受到了通过保留民俗习惯来保持以民族为中心的同一性的意图的影响。同时,正如在俄罗斯以《民族自我意识、民族主义和俄罗斯联邦国内冲突的调解》为题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的那样,非教徒比教徒表现出更大的“民族利己主义”倾向,也就是说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间相互宽容和形成“肯定的认同”^[6](P239-241)。

宗教属性清楚地反映在族群对文明选择问题的立场。同时这里说的不仅是东正教和伊斯兰教这种二分法,而且还有一部分居民的二元性,他们在以具有相近的文明、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为目标和热衷于“特殊途径”之间分道扬镳。

从今天俄罗斯社会政治文明定位的角度来看,主要问题仍然是发展模式问题。变革过程的趋向表明,文化相近、经济上有吸引力的西方已被选定为参考坐标系统(90年代初表现得颇为极端:当时俄罗斯实行“100%的亲西方”政策),同时,一些面向过去的肯定的认同的依据仍然是一些维护传统的观点,实现现代化也要重视这些传统观点,跟过去相连的是民族尊严和民族自豪的观念,现代化进程则往往跟危机、跟放弃大国立场和忘记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正是这里面隐藏着“特殊途径”这一理念的“生命力”的秘密。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和分析现行的俄罗斯内外政策,就不会感到俄罗斯的不可理解和难以预测。对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后,普京总统对内实行“与民主原则背道而驰”的政治

改革政策；对外与西方国家龃龉不断，乃至 2005 年 2 月 25 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在斯洛伐克还得给普京上民主的“公开课”的现象，也能唔出其原委。

对一种民族文明和一个国家内外政策的形成的认同，其稳定不变的重点是在整个社会文化领域内形成的。苏维埃制度是不让民族、宗教和文化分歧显露出来的，随着这种制度的解体，俄罗斯又恢复了不同方向的社会文化进程。但是，如果说未来是属于一些大的多元文化共同体（俄罗斯无疑也属于这种共同体）的话，那么这些共同体如果没有带肯定色彩的文化认同，也是无法巩固的。这种认同必须得到对社会发展模式问题的广泛同意，得到对作为独一无二的社会和文化共同体“独立”的必要性的同意，得到公民的忠诚和公众环境的宽容。这种认同的基础是共同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在多样性中统一的逻辑。这种民族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广泛认同的形成是现代民族文明选择的关键，也是判断一个国家内外政策稳定或发生变化的重要依据。

[参 考 文 献]

- [1] Экспертные оценки ФОМ [N].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03-11-03.
- [2] Яковенко, И. Г. . П.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и [J].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1994 (2).
- [3] Редакция. Опрос ВЦИОМ [N].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3-10-14.
- [4] Редакция. Религия [N].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0-01-22.
- [5] Редакция. Религия [N].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3-08-20.
- [6] Мусина, Р. Н.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ь как фактор меэтн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Татарстан [J]. Опыт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оссии, 1998 (4).

(责任编辑 车 英)

Russia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in Transformational Period Cultural Elements

LIU Zai-q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U Zai-qi (1967-),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bstract: A serious crisis occurred in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Russia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which brought rapid changes in Russian society, politics and daily life. Cultural elements play a strik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identity of the Russian nation and civiliz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and make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the Russians' identification of modern society and politics as well as on the formation of valu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rresponding mechanisms. If someone wants to observe and study every phenomenon in Russian society, the inner policy and diplomacy, he must consider the influences of the particular history, tradition, religion and people's notion of Russia.

Key words: Russia; political diplomacy; cultural elements